

德国剧作 *Wilhelm Tell* 的东游与森有礼英文著作
Education in Japan 《文学兴国策》之西游
- 近代(1880-1907)东亚西学译书的跨国翻译流传研究

吴淳邦*

第1節 绪言

第2節 *Wilhelm Tell* 的中译本《瑞士建国志》及其两种韩译本

第3節 跨国译书《文学兴国策》的流传与朴殷植的〈兴学說〉

第4節 近代東亞文学著作的跨国翻译流传

〈국문초록〉

일본 明治維新(1868년) 시작부터 중국 五四運動時期(1919년)까지 동아시아 한중일 세 나라에서는 국가의 개혁과 현대화를 위해 전면적으로 西學을 받아들 이게 되는데, 西學의 전면적인 도입은 주로 번역사업을 통해 이루어졌다. 독일 쉴러(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의 劇本 *Wilhelm Tell*과 日本 모리 아리노리 (森有礼 Mori Arinori, 1847-1889)의 영문저작 *Education in Japan*은 각각 《瑞 士建國誌》와 《文學興國策》이란 서명으로 번역되어 당시 서구의 자유·독립 및 교육사상을 받아들이는 대표적인 번역서로서 동아시아에 널리 전파 유통되었다. 쉴러의 독일어 원본은 중국인 鄭貫公이 日譯本을 저본으로 삼아 中譯本으로 재 탄생되었고, 박은식과 김병현은 中譯本을 저본으로 다시 韓譯本을 번역해내었

* 天津师范大学“千人计划”招聘专家、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客座教授

으니, 우리는 이 번역과정을 통해 《윌리엄 텔》의 東遊經路를 알게 되었다. 모리의 *Education in Japan*은 일본인이 영문으로 저술하여 1873년 미국 뉴욕에서 출판한 서적을 중국에서 활동하는 미국선교사 존 알렌이 1896년 中國文言으로 번역한 漢譯書로 19세기 말 중국과 조선에 전파되어 근대 동아시아 교육기관 창립에 직접적인 영향을 미쳤다. 이 두 작품은 저자, 역자의 다국적과 여러 언어를 경유하는 번역과정을 가지고 있는 근대 동아시아의 각별한 번역서들이다.

본 논문은 근대 동아시아 문학교류의 관점에서 두 권의 번역서가 동아시아에 어떻게 번역 전파되고 동아시아 三國에서 있었던 文體(使用言語)의 전환과정을 “번역”이란 유통경로를 통해 종합적으로 고찰해 보았다. 특별히 20세기 초기 大韓帝國時期에 번역된 두 권의 韓譯本은 모두 鄭貫公이 번역한 中譯本 《瑞士建國誌》를 참고하여 번역한 것으로 使用言語가 國漢文混用體와 한글전용체로 다르긴 하지만, 두 권의 韓譯本역시 言文一致를 추구하는 근대 동아시아에서 진행된 문학개혁의 基調를 지향하고 있음을 발견하였다. 본 논문은 두 권의 譯書 연구를 통해 근대 동아시아에서 있었던 西學譯書의 글로벌화(세계적)한 번역문학의 특성을 집중적으로 탐구해 보았다.

핵심어 : 《빌헬름 텔》, 《서사건국지(瑞士建國誌)》, 《*Education in Japan*(일본의 교육체계)》, 《문학흥국책(文學興國策)》, 모리 아리노리(森有禮), 정관공(鄭貫公), 박은식(朴殷植), 김병현(金炳玄), 존 알렌(Young John Allen, 林樂之), 동아시아 三國의 文學翻譯과 전파

第1節 緒言

从晚明到清代中前期, 天主教耶稣会士成为西学的主要译介者。通过他们的著译工作, 东方世界接受了解西方文化, 天主教传教士主要译介基督教文献与包括天文地理的西方宗教科学技术文献。臻至19世纪初, 改新教传教士来华, 传播福音起, 他们通过例如米怜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郭

实臘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傅兰雅的《格致汇编》、林樂之的《万国公报》等众多传教士报刊来译介各种西学。但到了清日战争后，流通通道与以外国人为主的译者身分转变成华人精英文人，西学东来通道也转变成经过日本的东来通道趋向。尤其是戊戌改革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积极接受并翻译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大大流行的日本西学译著，海归留学派精英文人，例如严复等文人也参与了西学名著的翻译工作队伍。

自傅兰雅于1895年发起〈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小说征文活动，开启了小说启蒙运动的序曲。1902年为现代中国文学改革的分水岭，梁启超首先发行《新民丛报》，其后创刊《新小说》倡导小说界革命。同年发表译作《十五小豪杰》和自创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藉此树立了新的国民模板，并揭示未来理想国家的蓝图。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直接引导启发晚清新小说类型发展，小说文体从此开始由文言转型为白话，发展成言文一致的现代汉语。有学者论没有晚明，何来晚清？自晚明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清初马若瑟的天主教中文小说，已初显文体转型白话之端倪。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故本文经由席勒著、郑贯公译的《瑞士建国志》、森有礼著、林樂之译的《文学兴国策》等文献，从翻译、启蒙的角度来考察探讨明治维新到晚清时期世界文学文学萌芽期的跨国文学交流情形与文学、文体的转型问题。此两种文本都有各自的文献特点，流传到东亚日、中、韩三国，转译成不同译本，产生深远的影响，可说是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近代东亚三国接受西学的代表译书。

第2節 *Wilhelm Tell* 的中译本《瑞士建国志》及其两种韩译本

1803年席勒完成剧作 *Wilhelm Tell*, 这部体现爱国、自由民权的剧作一经出世迅速风靡欧洲大陆。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 - 1805) 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 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 也被公认为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1803年, 席勒完成他人生最后一部剧作 *Wilhelm Tell*(现代中译本名《威廉·退尔》)。1801年, 德国与法国签订和约, 德国莱茵河左岸土地全部沦陷为法国领土。出于对祖国安危的担心和对自由的热爱, 加之1803年正值拿破仑占领瑞士。席勒将1307年冬瑞士人民结盟推翻奥皇统治的史实与瑞士民间关于退尔的英雄传说结合起来, 塑造出“威廉·退尔(Wilhelm Tell)”这一反抗异族和封建统治、进行解放斗争的典型人物。这部剧本于1804年3月在魏玛和莱比锡演出时, 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被看作是一部有高度现实意义的爱国剧本, 是唤起民族意识和反抗外侮的有力呼声。尤其是剧中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及体现出的西方近代自由、民权启蒙思想使其日后在东亚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

日本明治初年的翻译出版仅限于文学翻译。1872年(明治5年), 斋藤了庵翻译的《英国鲁敏孙全传》(《鲁滨逊漂流记》) 是明治时代第一部日译欧美文学作品。1880年(明治13年), 齐藤铁太郎·泉增吉共译《瑞西独立自由之弓弦》, 该译作是日本明治以来翻译的第一部德国文学作品, 底本即席勒的剧作 *Wilhelm Tell*。翌年, 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者板垣退助在日本创立自由党。 *Wilhelm Tell* 正是在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下被有需求地改译成日文的。¹⁾ 该时期 *Wilhelm Tell* 日文单行本译作及连载译

1) 详见田中亮平, 《明治日本のドイツ文学・明治日本德国文学》, 《創価大學外國語學科紀

作总合多达十几种。1868~1902年的34年间, 可查的 *Wilhelm Tell* 日文译本如下:

- (1) 齐藤铁太郎·泉增吉共译, 《瑞西独立自由の弓弦》, 三余藏堂/白水增吉, 明治13年(1880)
- (2) 山田郁治 (松湖渔史) 译, 《哲尔自由谭 (自由之魁) 前编》, 泰山堂/甘泉堂, 明治15年(1882)
- (3) 桑野锐译, 《建国遗训》, 《常総青年》, 明治16年(1883)
- (4) 盧田束雄 (半窓睡仙) 译, 《字血句泪 回天之弦声》, 一光堂, 明治20年(1887)
- (5) 谷口政德译, 《血泪万行 国民之元气》, 金泉, 明治20年(1887)
- (6) 中川霞城 (霞城山人) 译, 《自由之一箭(维廉的儿)》, 《少年文武》, 明治23-24年 (1890-1891) 3月连载。
- (7) 汤谷紫苑译, 《ウキルヘルム テル》, 《女学杂志》, 明治26年(1893)
- (8) 中内蝶二译, 《ウイルヘルム、テル》, 《新文芸》, 明治34年(1901)1月~3月连载。²⁾

从上文可看出日译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1887年之前的译本题目皆为译者用汉字重起而成, 1887年之后的则以日文片假名音译原著题目而成; 二、1890年前的译作皆为单行本译作, 之后至1901年3月则以报刊杂

要》第17号, 創価大學文學部外國語學科, 2007年, 第89页。

2) 1868~1902年间 *Wilhelm Tell* 日文译作年表主要参考川户道昭、榊原贵教编著《圖說翻譯文學綜合事典》第2卷中的ウイルヘルム・テル翻译作品年表整理而成; 其他补充书目分别参考如下研究: 久松潜一等编修《现代日本文学大年表·明治篇》, 株式会社明治書院, 1968; 徐黎明, <翻译的政治与政治小说的翻译--略论《瑞士建国志》在东亚的翻译传播>, 韓國語文學第十次國際學術大會, 2010年。尹英實, <東亞細亞 政治小説의 한 样象- 《서사건국지 瑞士建國志》 翻譯을 中心으로>, 《尙虛學報》第31辑, 2011年。

志连载译本为主。三、日文单行本译作更多将原著的戏剧文体改译成小说文体, 连载译作的文体则忠实于原著的戏剧文体。 *Wilhelm Tell*在日本明治时期的翻译特点的变化,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日本读者阅读习惯在语言、文体和文学传播载体上的变化。

1902年的中国处在晚清摇摇欲坠的封建皇权统治下, 此时的中国虽有一副国家的皮囊, 实质却早被西方列强几近瓜分完毕。在此亡国危机之下, 曾经东渡日本留学的广东人郑贯公抛弃维新思想, 转投革命, 期望通过笔墨唤醒中国普罗大众推翻清王朝及列强的殖民统治。于是, 他参照*Wilhelm Tell*的日译本, “转接增删” 著成白话小说《瑞士建国志》。中译本《瑞士建国志》是在清帝国国权沦丧、国民面临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该译作是 *Wilhelm Tell* 在中国的最早译本。有关中译本《瑞士建国志》参照的日文底本, 至今学界尚无定论。郑贯公在该书 <例言> 中说道: “是书故事, 初由西文译为日本文, 复从日文译其意, 著为小说。转接之多, 增删遗略, 在所难免。然小说不比正史, 事不必尽有, 而理不可无, 总求描情写景, 明白了利为近旨。既然是“译其意”, 可知《瑞士建国志》并非直译, 而是在参照日文故事梗概的情况下进行的再创作。中译本《瑞士建国志》翻译时表现出的中国本土文学再创作特征, 确保了本文从中·韩翻译文学的角度研究两种韩译本翻译特征的可行性和价值。

光武11年7月 (1907年8月), 近代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朴殷植以中译本《瑞士建国志》为底本, 译出韩汉混用体《瑞士建国志》; 同年(隆熙元年11月), 著名译家김병현(金炳炫) 又以前两种版本中之一为底本, 译出纯韩文译本《서사건국지 瑞士建国志》。两种韩译本的翻译绝非偶然, 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原因。1905年秋, 日俄战争结束后, 日本同大韩帝国签订《第二次韩日协约》。协约中剥夺了大韩帝国的外交权, 规定日本政府在汉城设立“统监府”, 大韩帝国国家元首只能在得到统监允许并在监

视下接见大臣和外国使节。这实际上是日本炮制的一个间接统治大韩帝国的方案。闻此消息，韩国近代著名报人张志渊于1905年11月20日《皇城新闻》第2101号发表了题为〈是日放声大哭〉的论说，揭露日本妄图侵吞韩国的本质。这篇文章引起当时整个韩国舆论界的哗然，大批仁人志士的忧国衷情被唤起，开始以不同的形式投入到恢复“国权”，争取自由独立的运动中。1907年，国际和平会议于6月15日~10月18日在荷兰海牙召开，大韩帝国皇帝李熙向海牙秘密派遣使节，希望向国际和平会议提出《保护条约》无效，呼吁与会各国代表帮助韩国恢复独立，但日本事先掌握了事件发展动向阻挡此举，使韩国代表未能出席会议。海牙密使事件的败露，直接导致了韩国与日本7月24日《第三次韩日协约》的签订，此条约签订一周之后日本解散了韩国军队，完全剥夺韩国行政、立法、司法、人事等权力，全部由日本统监支配，至此韩国事实上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在大韩帝国国祚不兴的背景之下，为启蒙民众爱国精神，号召民众起身反抗日本的殖民压迫，恢复自主国权，两部韩译本译者使用不同文体在同年翻译同一部《瑞士建国志》，足见文学翻译在时代政治环境的变迁中推陈出新的功用。³⁾

朴殷植翻译的韩汉译本《瑞士建国志》和金炳炫翻译的纯韩译本《서사건국지》故事情节與中译本《瑞士建国志》相同。从细节比较，韩汉译本较为忠实底本中译本的内容，诗词内容大多直接摘录；而纯韩译本则在故事情节不变的情况下，删削了中译本出现的大量诗词内容，此外还调整了部分段落语句的位置。图书版权页及封面内容文字信息并非仅仅显示书目、内容及作者出版机构那么简单。以封面文字信息而言，朴殷植使用韩汉文书写，其面对的读者为两班阶层知识分子。而金炳炫以纯

3) 王长江、吴淳邦，〈*Wilhelm Tell* 的中译本《瑞士建国志》及其两种韩译本研究〉，《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第44辑，中国语文论译学会，2019年1月，第80-86页。

韩文行文，因为一般百姓无法阅读汉文，明显是预设以百姓为读者，以扩大读者层增加作品社会影响力为目的。故选择使用何种语言，可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内读者层的实际需求。

近代东亚韩、中、日三国有关政治的文学翻译多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诸如 *Wilhelm Tell* 在东亚的翻译完全是有志之士为启蒙民众而借用翻译大声疾呼自身政治抱负的工具。因此，通过日、中、韩三种译本的比较发现，郑贯公参考 *Wilhelm Tell* 的日文重译本之外，更加注重译作的文学创新性，处处体现着极具中译者个人文学魅力的文学创作风格。郑贯公的文学翻译可以视为中国翻译文学本土化的创意性体现。韩汉文与纯韩文翻译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韩汉文翻译倾向直译，很少改变中译底本的语句顺序，即使改变也只是句内句子成分的位置调换：遇到诗词歌辞等韵文时，多采取直接摘录底本原文或在不改变底本的基础上添加韩文助词格，以方便读者吟诵。相比之下，金炳炫的纯韩文翻译则有着删除底本诗词等韵文的翻译特征。歌词的翻译则由中译本的对仗体改用了不拘一格的自由新体诗风格。纯韩文译本的翻译更接近中译本的翻译风格，除“删节增改”外，还呈现出追求“言文一致”及翻译文学本土化的特点。在近代东西文明交融的时代背景之下，受新旧知识体系的双重影响，中韩两国的翻译文学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烙印。追求翻译文学的本土化是两国的共同点。不同点在于同样的译作在大韩帝国时期有着两种翻译文体的对立。两种韩译本译者对中国翻译文学的重译有着翻译策略和特点上的差别，这样的差异间接反映出不同译者的不同政治、语言和文学观念，以及译作阅读对象群的差异。

第3節 跨国译書《文学兴国策》的流傳與朴殷植的《兴学說》

1872年(明治5年)2月3日, 时任日本明治维新政府驻美公使森有礼(Mori Arinori, 1847-1889)⁴⁾ 受命寻找维新图强的兴国良方, 向当时美国各界15位著名人士发出了征询意见函。他在信函的开篇中写道: “敬启者: 自膺简命, 驻贵国京都护理公使, 除办理美、日交涉事务外, 尚奉特旨, 访察一切凡有益于敝国文学诸事, 并讲求一切凡有关于敝国振兴诸端。度阁下必有卓见良策, 请烦一一指教, 以作东方开化之助, 实为幸甚。”⁵⁾ 森有礼询问振兴国家良策的殷切之情, 很快得到各方的热烈回应, 发函后的一个半月内, 收到14位名士的复函。森有礼将这些信件内容以及摘自美国教育部的 <美国兴学成法>⁶⁾, 加上自己撰写的 <日本历史概略> 汇编成 *Education in Japan* 一书, 于1873年1月1日在纽约 D. Appleton & Company 出版。⁷⁾

时隔23年後的1896年(光绪23年), 在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⁸⁾

-
- 4) 森有礼: 日本明治初期的外交官、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早年留学英国, 1870年-1873年出使美国, 归国後任外务大臣, 大力传播、普及西方思想。1885年伊藤博文内阁建立, 任文部(教育部)大臣, 致力于日本教育的改革。1886年3月废止原有的“教育令”, 颁布“学校令”和“帝国大学令”, 4月又发布“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及其他学校通例, 确立了日本教育学制的基礎。森有礼的生平事跡參見佐伯好郎著, 《清朝基督教の研究》, 春秋社, 昭和24年初版, 620-621頁; 拙著, 《中國近代小說翻譯與中韓小說雙向翻譯研究》, 崇實大學出版社, 2008年, 188-190頁。
 - 5) 森有礼, 《文學興國策》, 林乐知、任廷旭译, 上海: 廣学会, 1896年。
 - 6) 1896年版《文学兴国策》下卷最後一章题为<美国兴学成法>, 其下用小號字體注解到<从美京文学部摘錄>, 此处“文学部”为今教育部的舊译, “美京”即美国首都。《近代文献丛刊·文学兴国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 第59-60、65、66页。
 - 7) 拙著, 《中国近代小说翻译与中韩小说的雙向翻译研究》, 第188页。
 - 8) 林乐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 字荣章, 生于美国乔治亚州, 美国监理会传教士, 教育家, 翻译家。咸丰十年(1860年), 偕夫人到中国上海传教。热衷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 曾创办中西书院, 后发展成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东吴大学。中国近代著名报刊《万国公报》的创始人之一。译著颇丰, 代表作有《中东战纪本末》、《全球五大洲女

协同他的华人助手任廷旭⁹⁾将森有禮编的 *Education in Japan* 选译成浅近文言文，冠名为《文学兴国策》，並於1896年5月(光绪22年3月)在上海由图书集成局代印，廣学会出版发行。全书由上下两卷组成，按内容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翰林院庶吉士龚心铭和林乐知二人所做的两篇序文组成；第二部分由森有禮所发公函及十三位名士复函的内容组成；第三部分是摘录自美国教育部的〈美国兴学成法〉。对比英文版 *Education in Japan* 可知，林乐知翻译时没有全书照译，而是翻译了森有禮所发公函及十三位名士复函，以及附录〈美国兴学成法〉，少译了该书的森有禮讲述日本历史部分的〈绪言〉，以及维笃尼对森有禮提出日本采用英语作通用语言的回函。从林乐知对翻译的取舍，可以看出他翻译《文学兴国策》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中国人效仿日本，变法图强，学习美国教育经验和制度。¹⁰⁾ 其实，在未翻译《文学兴国策》之前，林乐知本人就已经身体力行尝试将美国教育新式教育理念〈男女教育平等〉、〈教育与基督教密切结合〉、〈创立各类学校〉等在中国试点推行。¹¹⁾

除此之外，为吸引读者注意，强调译书的“兴国”之能效，林、任二人在翻译书名时也可谓煞费苦心。英文原书名本为 *Education in Japan*，在此却把“Education”译为“文学”一词。如果按现代英汉双语翻译的

俗通考》、《印度隸英十二益说》等。參見顧長聲著，《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63-265頁。

- 9) 任廷旭(生卒不详): 光绪进士, 从散见资料可知他擅长英中笔译, 是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的华人主笔之一, 曾受清廷派遣担任过驻美公使的随员, 并游历过日本。代表译着有《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印度史攷要》、《广学类编》、《文学兴国策》等。參見《中国近代小说翻译与中韩小说的雙向翻译研究》, 192頁。
- 10) 赵建民, 〈森有禮的 *Education in Japan* 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影响〉,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9卷第2期, 2001年, 第55頁。
- 11) 1881年, 为实现把办教育作为宗教渗透、推进中国政治改良、扩大西方国家影响的愿望, 林乐知辞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和制造局翻译职务, 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创办了“中西学堂第一分院”。1882年, 又于虹口吴淞路开设了第二分院, 合并两校更名“中西书院”, 该校后迁至苏州, 是现苏州大学即东吴大学的前身。1892年, 在上海创办中西女塾。

话,“Education”应译为“教育”,则书名应翻为《教育兴国策》。那么,“教育”为何在120年前被译成“文学”?主要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教育”一词,而“文学”一词则始于《论语·先进》,孔门四科之一,指的是文章学问。另外,古今中外也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称为文学。清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当时的学习和教化都离不开“文章学问”。《文学兴国策》的读者群主要是与科举相关的读书人,因此,这里将“教育”译为“文学”也不足为怪。这种译法留下很深的地域、译者、读者和时代烙印,是翻译“本土化”的典型产物。更为有趣的是,*Education in Japan* 完全可以直译题目为《日本文学策》(《日本教育策》),但二人却意译为《文学兴国策》,改变意义明确的定语短语“in Japan”为所指模糊的动宾结构“兴国”,这就能引起更多关心国事的中国人关注该书,真可谓用心良苦¹²⁾。林乐知和任廷旭二人的辛苦翻译没有白费,1896年此书在中国出版后,引起了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对晚清维新思想的酝酿起了积极的影响,也对晚清中国近代学校创立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¹³⁾ 甚至这部译书的影响还波及到了中国的邻邦韩国。该书出版后不久即随其他书籍一同传入韩半岛;1901年,韩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朴殷植¹⁴⁾ 参考汉译本《文学兴国策》编写〈兴学说〉,上

12) 高黎平,〈论林乐知的西学翻译及其在晚清的接受〉,《国外文学》第1期,2006年,第91-92页。

13) 肖朗,〈《文学兴国策》与近代中、日、美文化教育交流〉,《浙江大学学报》第32卷第1期,2002年,第21页。

14) 朴殷植(1859-1925),字圣七,号谦谷,韩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报人、历史学家、独立运动家。他自幼聪慧,被坊间传为“神童”;1882年(24岁),师从第三十代朱子学世家传人“朴文一”,系统学习朱子学。1888年(30岁),受闵泳骏推荐赴任崇仁殿参奉,随后开始步入仕途,与守旧派官员交往甚密;1898年(40岁),加入社会政治团体“独立协会”并担任《皇城新闻》主笔,此时的朴殷植通过阅读从中国或日本流入韩国的新书籍、报刊、杂志了解西学。盧承允,《朴殷植의 民族教育思想研究》,韓國中央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7年,7-17頁。

“大韩帝国学部。〈兴学说〉即是他本人接触西学思想后所作的融汇东西的教育论，是一篇能够充分体现朴殷植维新教育思想的论说文。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教育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第二、介绍西方教育的学科建设情况；第三、痛陈韩国教育不振现状；第四、针对当时大韩帝国现状，提出六项教育维新方案。这四个部分，除第三项外，其余三项所述内容多是由《文学兴国策》中摘录改编而成。大韩帝国皇室、韩国开国总统李承晚、韩国近代著名思想教育家朴殷植都曾接触《文学兴国策》。其中李承晚在狱中生活期间摘录了该书的部分章节；朴殷植则于1901年作上书大韩帝国学部的〈兴学说〉一文时参照了书中的大部分有关西学的内容。¹⁵⁾ 朴殷植的〈兴学说〉虽大量参照《文学兴国策》内容，但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朴殷植并非单纯地摘抄拼凑文章，而是结合当时韩国的社会现状因地制宜地对文章做了内容和顺序上的调整与改写；因他自幼接受系统的朱子学教育，故在接受《文学兴国策》西学教育思想的同时，仍坚持传统儒家伦理价值观，这种东西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除内容和思想之外，朴殷植的汉文写作风格也很独特，行文洒脱自然，逻辑清晰，通俗易懂，且感情充沛易于感动人心，极富文学价值。1904年，朴殷植在〈兴学说〉的基础上编著并出版了单行本《学规新论》。全书系统地展现了朴殷植融合东西的教育思想，它是《文学兴国策》在近代韩国的又一对话之作，也是近代韩国第一部专门论述教育的单行本著作，其在韩国教育史上的意义已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本节通过《文学兴国策》与朴殷植前后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梳理出朴殷植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潮影响的路径，为东亚地区近代思想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又一可供参考的思路，即通过汉译西书窥见近代东西文化交流之

15) 吴淳邦、王长江，〈林乐知《文学兴国策》与朴殷植〈兴学说〉比较研究〉，《亚太研究》24卷4号，慶熙大學國際地域研究院，2017年12月，第109-114、122页。

实况与内涵。《文学兴国策》这部“非文学”的译本在日本、美国、中国、韩国四个国家之间出版、翻译、传播的过程中，此书比一般文学作品具有更高的价值与特色，并在中国和韩国获得新生；是翻译贯通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文学”在东亚中国与韩国间的传播更具时代的意义与特色。

第4節 近代東亞文学著作的跨国翻译流传

20世纪末以来，学界注意到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欧化白话译本的存在与影响，有学者提出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乃中国新文学的真正起源的观点。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依托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刊发了大量改良文言文文本和改良白话文本；这些改良文言文文本和改良白话文本，无论从题材内容层面，抑或从语言文体层面，都对本土作家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¹⁶⁾《劝善喻道传》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文言短篇基督教创作小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著，咸豐8年(1858)出刊，此书流传到日本，日本学者渡部温训点，明治10年(1878年)在日本东京刊发和式线装本，全书收录16篇短篇小说。全书的中文左右附加字体稍小的日文训点，是便于日本读者阅读的汉日文并记体格式，现藏于日本、美国、英国、中国等各地图书馆。丁韪良1850年来华前往宁波传教，曾参与将《圣经》译成宁波方言的部分工作，也曾试用汉字罗马文字编印一些福音书。1854年，出版了由中文编写的《天道溯原》，此书曾再版多次，广泛流传，还被译成日文与韩文。从1862年起到上海传教时，他将国

16) 袁进主编，《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章、第5章。

际法权威学者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译成中文，此书出版后第二年，转入日本。接着，丁韪良在同文馆工作期间，与他人合作先后译着《星轺指掌》、《公法便览》等多种国际法专著。明治维新初期，丁韪良的著作流传于日本，广受欢迎。¹⁷⁾

在东亚包括《圣经》的翻译，都从中文开始，文本译成中文后，流传于东亚各国，被译为其他方言。因此，译书的流通过程也是从中国到日本或韩国。这种流通通道从清日战争后发生了明显转变。经过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翻译的权威地位从中国迁移到日本，我们从前两种文本的翻译情形来考察过。自从1784年，朝鲜燕行使团的李承熏从北京带来圣经节译本《圣经直解》以来，韩国人都成为来自中国的中译圣经及汉文基督教文献等中文译书的接受者。19世纪最后5年以来翻译的权威迁移到日本以后，韩国仍然处于接受地位，其接受的对象多变化，韩国译者采取何种翻译态度与翻译策略？本论文以拥有三国译本的《瑞士建国志》、《文学兴国策》等文献为研究对象，从翻译、文学启蒙的角度来考察探讨近代东亚明治维新到晚清时期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翻译文体的转型问题。这两种文本都有各自的文献特点，流传到东亚三国，出版不同译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算是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近代东亚三国接受西学的代表译书。本文从“非文学类”森有禮的英文原著书名翻译成《文学兴国策》的翻译现象来考察译者对“文学”一词所持的看法；1803年席勒完成剧作 *Wilhelm Tell*。从19世纪80年代起，该剧作被改陆续译成8部不同版本的日文译作。1902年，晚清时期著名报人郑贯公参照其中一部甚至多部日文译作，“转接增删”译成白话章回体小说《瑞士建国志》。中译

17) 吴淳邦, <天理、人情、喻道、傳教--基督教文言小說《勸善喻道傳》的創作与流傳>, 《明清文學与思想中之情、理、欲--學術思想篇》,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9年, 第390-391页。

本虽译自日文，却有着独创的文笔，具备近代中国翻译文学中翻译加创作的特性；书中诗、词、歌、骈体檄文等文体皆由郑贯公根据小说情节独自创作而成，具有较高的中国本土化翻译样态。1907年8月，韩国著名文学家朴殷植以中译本《瑞士建国志》为底本，转译成韩汉译本《瑞士建国志》；同年11月，金炳炫亦在中译本基础上重译纯韩文译本《서사건국지瑞士建国志》。郑贯公将原为剧本的席勒原作译成白话章回体小说，改成新种小说作品，两种韩译本都随着郑贯公的中译本，译成口语韩文章回小说。而且《文学兴国策》出现其改写本〈兴学说〉以外，《瑞士建国志》出现了两种韩译本，这些译本也持有其独特的翻译策略及翻译特点。加拿大传教士奇一(James Scarth Gale, 1868-1937)1895年翻译出版的初刊韩译本《턴로력딩天路历程》出现了译者独创翻译的英文原著与中译本不同的23首“诗调体”诗歌¹⁸⁾，正像中译者郑贯公将原为剧本的德文原作改译成章回体小说作品，书中将独创的诗、词、歌、骈体檄文等文体插入重编，完成了典型的明清章回体小说模式。此为译者们配合东亚译语文化读者的阅读习惯，做出的本土化翻译成果。

18) 吴承逸、吴淳邦，〈首譯韓譯本《턴로력딩 天路歷程》詩歌的韓國本土化翻譯樣象研究〉，《中國學研究》第85輯，中國學研究會，2018年11月，第145-173頁。

▣ 参考文献

Friedrich Schiller, *Wilhelm Tell*, Tübingen :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1804, Digitale Ausgabe erstellt von Wikisource, 2012.

鄭貫公譯,《瑞士建國誌》,香港:中國華洋書局藏版(啓智書局),壬寅年(1902),上海圖書館藏影印版。

朴殷植,《白巖樸殷植全集》全5卷,首爾:東方媒體出版社,2002。

金炳玄譯,《서스건국지瑞士建國誌》,황성皇城:박문서관博文書館,융희원년십일월(熙元年十一月),1907,日本富山大學學術情報庫影印版、雅檀文庫影印版。

森有禮,《文學興國策》,林樂知、任廷旭譯,上海:廣學會,1896。

_____,《近代文獻叢刊·文學興國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文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I·II,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外國文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II,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

久松潛一等編修,《現代日本文學大年表·明治篇》,株式會社明治書院,1968。

韓國歷史學會編,《韓國史資料選集》,首爾:一潮閣,1973。

加藤祐三著/蔣丰譯,《東亞近代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

유용태/박진우/박태균 지음,《함께 읽는 동아시아 근현대사(개정판)》,파주:(주)창비,2016。

佐伯好郎著,《清朝基督教の研究》,春秋社,昭和24年(1949)初版。

顧長聲著,《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拙著,《中國近代小說翻譯與中韓小說雙向翻譯研究》,崇實大學出版社,2008。

袁進主編,《新文學的先驅--歐化白話文在近代的发生、演變和影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

盧承允,《朴殷植의 民族教育思想研究》,韓國中央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7。

趙建民,〈森有禮的 *Education in Japan* 在中國的翻譯及其影響〉,《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2期,2001。

肖朗,《文學興國策》與近代中、日、美文化教育交流,《浙江大學學報》,第32卷第1期,2002。

- 高黎平,〈论林乐知的西学翻译及其在晚清的接受〉,《国外文学》第1期,2006。
- 徐黎明,〈翻译的政治与政治小说的翻译--略论《瑞士建国志》在东亚的翻译传播〉,韓國語文學第十次國際學術大會,2010.10。
- 尹英實,〈東亞細亞 政治小説의 한 樣象--《서사건국지 瑞士建國志》翻譯을 中心으로〉,《尙虛學報》第31輯,2011。
- 罗衍军,〈步武瑞士肇建新邦--郑贯公与《瑞士建国志》〉,《文教资料》,2008.6。
- 许翼心,〈近代报业怪杰 文界革命先锋--爱国报人、作家郑贯公百年祭〉,《学术研究》第7期,2007。
- 田中亮平,〈明治日本のドイツ文學〉,創価大學文學部外國語學科,《創価大學外國語學科紀要》17號,2007。
- 拙著,〈天理、人情、喻道、傳教--基督教文言小説《勸善喻道傳》的創作與流傳〉,《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欲--學術思想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
- 吳淳邦、王長江,〈林乐知《文学兴国策》与朴殷植〈兴学说〉比较研究〉,《亞太研究》24卷4號,慶熙大學國際地域研究院,2017.12。
- 王長江、吳淳邦,〈*Wilhelm Tell* 的中译本《瑞士建国志》及其两种韩译本研究〉,《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44輯,中國語文論譯學會,2019.1。
- 吳承逸、吳淳邦,〈首譯韓譯本《턴로력녕 天路歷程》詩歌的韓國本土化翻譯樣象研究〉,《中國學研究》第85輯,中國學研究會,2018.11。

〈Abstract〉

The Study of Two Translations in East Asia
Modern Times(1880–1907): Journey to the East of
German Play Script *Wilhelm Tell* & Journey to
the West of Mori Arinori's *English Work*
Education in Japan

Oh, Soonbang

From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1868) to the period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hina(1919), the three countries of East Asia, Japan, China and Korea, tried to fully accept Western studies for their na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tudies was mainly done through the work of translating. The drama of *Wilhelm Tell*, by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 in Germany and *Education in Japan* by Mori Arinori (1847-1889) in U.S.A., were translated under the titles of 《瑞士建国誌 *Rui Shi Jian Guo Zhi*》 and 《文学兴国策 *Wen Xue Xing Guo Ce*》 respectively. These books were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distributed in East Asia as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s that embraced the ideas of freedom, independ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West at that time.

Schiller's German original was reborn as a Chinese translation by Chinese

Zheng Guangong with a Japanese translation as the original, and Park Eun-Sik and Kim Byeong-Hyun created a Korean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rough this translation process, we became aware of the path through which *Wilhelm Tell* flowed into East Asia.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John Allen translated Mori's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Education in Japan*, originally written in English and published in New York, USA(1873), into Chinese. Allen's translation(1896) was spread to China and Korea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had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se two works are special books of East Asia, which have complex translation process through three language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amined how the both books were translated into 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 and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problems in the three East Asian countries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channel of "translation". In particular, both Korean translations of the two volumes translated during the Korean Empi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ere translated by referring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Rui Shi Jian Guo Zhi* by Zheng Guangong. Although the languages used are different between Korean-Chinese and Korean-only versions, it was found that the two Korean translations also pursue the basic trend of literary reform in modern East Asia, which seek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written and spoken language. Through the study of two translated books,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lobalized translated literatures in relation of Western studies in modern East Asia.

Key Words : Schiller's *Wilhelm Tell*, *The Founding of the Swiss Republic* (《瑞士建國誌》), *Education in Japan*, 《*Wen Xue Xing Guo Ce*(文學興國策)》, Mori Arinori(森有禮), Translator Zheng Guangong(鄭貫公), Park Eunsik, Kim Byunghyun, Young John Allen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30일에 접수되어 11월 26일에 심사를 완료하고 12월 14일에 게재 확정되었습니다.